



「白團」的歷史意義 (1949~1969 年)

石弘毅*

* 石弘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輔系國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任台南縣六甲國中教務主任暨國立空中大學台南學習指導中心兼任講師。

一、前言

民國 38 年（西元 1949 年）11 月，前日本第 23 軍（通稱南支派遣軍）參謀長陸軍少將富田直亮（即白鴻亮）在國民政府派員秘密護送下潛抵台灣，並且在台灣秘密組成日本軍事顧問團，協助國民政府謀劃對付中共的作戰策略與軍事規劃。日人富田直亮的來台，開啓了近代台灣史上赫赫有名的「白團」之歷史序幕。

由於中日之間的歷史糾葛與愛恨情仇，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使得白團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因而後來有研究學者稱之為「影子兵團」（楊碧川）或「覆面部隊」（林照真）。白團，簡而言之，即日本人協助撤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所秘密組成的軍事顧問團。此一特殊團體，始於西元 1949 年 11 月至 1964 年 12 月，約有 15 年左右。但其實際上的延伸則更長，約有 20 年之久（白團在台灣歷經幾個階段的組織變化，即從圓山軍官訓練團到實踐學社、實踐小組等）。白團之所以充滿神秘色彩，以及成為當時蔣介石總統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執政時期的一種禁忌，原因是：一、蔣介石總統當時在美國的壓力與不信任下，秘密自行聘請曾經敵對 8 年之久的日本軍事人員為其訓練國府軍隊與擬定相關防衛計畫；其次，蔣介石在國民政府軍於大陸兵敗如山倒的情勢下，力挽狂瀾的一種努力；三、中國歷經八年的對日抗戰，中國軍民在日本軍閥荼毒下死傷無數，作為中國人的領袖以及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蔣介石當時的「以德報怨」政策，因白團的存在而有著另一種特殊意義，未如一般人所強調的中國人寬恕、博愛的美德。

白團的存在，長久以來在台灣近代史上始終是個秘密，對台灣的歷史發

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誠如留日學者戴國輝老師所說的：白團的存在是「台灣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課題」。¹白團的存在曾是一個禁忌的話題，亦是極機密的國家安全事務，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事實上知道這件事的人並不多。不過，終究歷史的還是必須回歸於歷史，紙始終是包不住火的。當白團的重要人物之一的日人小笠原清，在西元 1971 年八月號的《文藝春秋》雜誌上，以「拯救蔣介石之日本軍官團」為題，正式發表並揭露了由日本軍官組成的「白團」在台灣的工作活動始末。自此，「白團」的神秘面紗漸為世人所悉。

目前有關於白團的介紹主要有林照真女士的著作《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另一重要的著作則是楊碧川先生的著作《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這兩本書。林照真女士的著作《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被安排在時報文化出版社的「歷史與現場」系列叢書中，由於該書並不是屬於學術研究著作，因此，林照真顯然較著重的是白團事蹟的「史實性報導」；而楊碧川先生的著作《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其中除了參考林照真的部分資料外，也訪問了白團僅存的成員，諸如岩坪博秀、春山善良、井上正規、細木重辰等人，並由明治大學大學院博士班的江旭本先生協助錄影，可謂甚具參考之價值，然而，資料雖然珍貴，但有關白團所呈現的歷史意義，還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有關白團的相關研究，尚有日人中村祐悅於 1996 年出版的《白團》一書。中村祐悅於 1955 年出生於日本石川縣，曾協編過《帝國陸軍編制總覽》等書，這是有關於白團歷史較早的一本日文總論性著作。而白團論題最初的史料底本，應是之前由偕行社白團紀錄保存會所編寫的《白團物語》，而中村

1 戴國輝，〈台灣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課題〉，收錄於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序文〉部分；戴國輝，〈台灣史的微觀及宏觀〉，收錄於《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4 期，頁 20，1998.6。

祐悅的《白團》一書，正是運用這個史料基礎而成的第一本論著。²然而，該書的基本史觀較侷限於舊日軍軍官為求報恩於蔣介石，不惜隱姓埋名遠渡重洋協助國府孤島練兵，暗地整軍致力反攻大陸的基本論調，猶如歷史上的「句踐復國」的故事，較充滿悲壯的心理歷程。

白團，這個在二次大戰後、國共鬥爭下，由日本軍人所組成的特殊軍事顧問團體，究竟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如何協助處於劣勢的國民政府？其對台灣的影響與其歷史意義為何？實值得吾人進一步探討。因此，本文擬從白團的相關歷史中，探討其所呈現的歷史意義。

二、白團的時代背景

回溯西元1949年1月，當時的蔣中正被桂系軍閥，時任副總統的李宗仁所逼而下野，蔣介石回到浙江省溪口故鄉隱居。事實上，蔣介石當時雖然表面上下野了，事實上他仍透過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力繼續掌握國民黨的一切軍政大權。而李宗仁雖然貴為代理總統，但是他並未具有實際上的指揮能力。國共鬥爭的結果，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蔣介石為了固守最後的一線退路——台灣，他草擬了防守及治理台灣的計畫。

早在1946年10月，蔣介石與其夫人宋美齡女士就曾到台灣巡視，巡視的結果讓蔣介石認為台灣具有相當的條件，不管是地形或戰略上的需求，台灣在大陸情勢不利國民政府的情況下，將來或許可以成為反共復國的復興基地。

西元1950年春，國共內戰的情勢迅速逆轉而下，誠如當時蔣經國先生所

2 吳明勇，〈評介中村祐悅著「白團」——兼論戰後初期台灣陸軍野戰軍團的形成〉，《近代史學會通訊》，第7期，頁57。

描述的：「江南半壁……風聲鶴唳，草木皆兵」，³國民政府在接連對中共軍事不利的敗績之下，國軍不得不撤守台灣、澎湖。

國軍的接連敗績，使得蔣介石總統不得不反省國軍失敗的理由，特別是敗給他曾經輕視過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檢討得失後的結果，蔣介石總統認為國軍缺乏三軍聯合作戰的經驗，無法發揮統合戰力，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時的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態度並不理想，蔣介石總統感受到美方的不可依恃，因此，他思考後認為如果能利用日本人的軍事戰略與能力來訓練國民政府的軍隊，或許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

中、日之間歷經長達 8 年的抗戰，何以蔣介石會想到聘請戰敗的日本軍官為中國訓練軍力？又何以日本軍閥願意放下成見，協助國民政府對抗共產黨，亦即介入中國的內戰？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事實上，蔣介石心裡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之所以投降，並不是敗在國民政府軍隊的力量，而是敗在美國投在日本廣島與長崎的兩顆原子彈，簡而言之，日本實際上是敗在美國人的手上。那蔣介石為何不聘請美軍軍事顧問團呢？事實上在白團成立後不久，台灣當時也有美國人所組成的軍事顧問團存在。然而，蔣介石認為美國是不可信任的，尤其在國共鬥爭的過程中，美國政府深受親共人士的影響，對於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並不友好，且態度常令蔣介石深感疑慮。因此，蔣介石決定透過各種關係與管道，企圖引入日本舊軍人來加強國民政府軍隊的戰力與提升士氣。事實上，蔣介石的構想並非偶然，白團的成立與曹士澂將軍的建議有密切關係。

曹士澂（陸軍士官 43 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賀顯祖上將的女婿，⁴當時官拜少將，1949 年 4 月左右因功升為東京駐日代表團少將組長。曹士澂將軍

3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頁 201。

4 賀顯祖在 1949 年投靠中共。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辦理日軍解除武裝及遣送工作，又接辦追訴戰犯案件，他獨排眾議主張應無罪開釋岡村寧次（當時的岡村寧次被中共列為第一號戰犯）。據曹士澂事後自述：「當民國 38 年，我政府撤退來台，軍隊在外島尚未集中，當時人心惶惶、士氣低落，國際上孤立無援之際，本人發動利用外來助力，保衛台灣，重建國軍，反攻大陸，這就是創始白團的主要目的。」⁵由於曹士澂與當時的知名將領，諸如何應欽、湯恩伯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老學長的關係良好，因此被蔣介石委以重任，他的任務就是秘密接觸岡村寧次等戰敗的日本軍人，媒介戰後日本軍人為國民政府效力，協助國民政府對付中國共產黨。

曹士澂受命後，於 1949 年 9 月 10 日，在日本東京高輪的一間小旅館內，與 10 多名中、日軍官秘密聚會。在密室中，中國方面代表是曹士澂少將、陳昭凱上校，另有王亮以中華民國代表團成員在旅館外負責把風，防止當時的駐日美軍臨檢發現；而日方代表則為岡村寧次大將、小笠原清（階級中佐，支那派遣軍參謀）及富田直亮等率領的 12 個前日本軍官。在岡村寧次的見證下，曹士澂、富田直亮等簽下「打倒赤魔」的誓約。這份誓約的內容大致可以發現中日雙方對於共產主義蔓延的疑慮與防堵態度。誓約內容大致如下：「值此赤魔逐日風靡亞細亞大陸之際，當是尊重和平與自由、堅信中日提攜之中日兩國同志應共同奮鬥，共同保衛東亞的反共聯合，更加熱切合作邁向反共之秋。茲以應日本方面欣然同憂相謀，邁向打倒赤魔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招聘，期待建立中日永久合作之基礎。」⁶

5 曹士澂，〈奇蹟仁恕與報恩的交集〉，收錄於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台北：時報文化，1996.7.20，頁 12～16。

6 參閱楊碧川，《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頁 17；然另對照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頁 59～60，所記為：「值此赤魔逐日風靡亞細亞大陸之際，當是尊重和平與自由、堅信與××合作為要之××同志奮起，共同保衛東亞，聯合反共，更密切攜手邁向防共之秋……。」內容有所出入。

雙方結盟後，在有意的安排下，日本軍人開始設法分批偷渡到台灣協助蔣介石進行反共大業。而實際的秘密進行偷渡過程據曹士澂回憶，則為「岡村（寧次）先生…多方選拔適合之優秀軍官，經訂約並取化名後，晉見岡村先生，說明赴台援華的目的與任務，再引見本人，授與保密暗號等有關事項（特別注意服裝與面容，不可留日式小鬍子），分別餞行後，由本組組員王亮先生送至神戶待船出發，在上船前，領取偽船員證，船抵基隆，由我方人員上船，認明暗號，接送北投團員宿舍，向白團長報到」。⁷

白團成員來台是充滿機密性的，特別是避免被美方知悉。為了避人耳目，在其與國府人員秘密接洽的識別方式上，特別規定：「白團成員，穿西裝、在西裝外衣左上小袋上，插放白手帕一塊，露出兩角；中方的接待人員也著西裝，在西裝外衣左上小袋內，插放黃色手帕一塊，露出兩角。白團團員身份證，填福州或廈門籍貫，用化名、貼照片。」⁸由於事屬極度機密，因此白團成員中，甚至有幾位團員連其妻子也未告知，後來還造成其夫人們因找不到自己的丈夫而報警，要求日本警方追查其先生疑似失蹤、被綁架、被暗殺等狀況。

中、日間雙方戰敗軍官的聯盟，其實在當時並非完全的機密。1949年8、9月籌組白團階段，中共新華社即在9月1日轉發一則香港光明日報（1949年8月27日）的報導，云曹士澂在日本與岡村寧次密謀集結日本人赴台，協助蔣介石作戰的消息。由此可知，顯然中共方面在東京旅館密約簽定前，即已獲悉此事。其實，在當時國民政府高級將官中充斥著中共佈局的所謂「匪諜」之情況下，消息走漏亦不足為奇。

7 曹士澂，〈奇蹟—仁恕與報恩的交集〉，收錄於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頁13～14。

8 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頁59。

不管如何，從白團成員陸續來台後，這批日本軍人遂成為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外籍傭兵集團，為國民政府與台灣規劃與訓練軍事力量，目標是希望國民政府有反攻大陸的一天。

當曹士澂接洽岡村寧次協助招募日本軍人，岡村原本制定的援台計畫，曾一度以招募 3000 名日籍軍人為目標，計畫招兵組成 10 個師，此即岡村之「義勇軍招募工作要領」。這一原始計畫透過吳鐵城從日本帶回台灣給蔣介石參考，但蔣介石認為目標過於明顯而沒敢接受，以致擱置了原始計畫。後來，經過來回的溝通與討論，雙方同意以招聘「外籍教官」作顧問團的方式，組織日本軍官赴台訓練國軍與設計作戰與軍事制度。

首先，岡村寧次選定以前日軍駐廣東第一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少將為首的第一批「十七人小組」，以各種方式先偷渡來台。富田直亮並曾於 1949 年 11 月隨蔣介石親自搭機飛抵重慶，協助指揮國軍對中共作戰。但時勢對國民政府非常不利。西元 1949 年 12 月 10 日，蔣介石棄守大陸。之後，白團成員第二、三、四批分別於 1950 年到 1952 年間分批抵台。1950 年 2 月 1 日，首先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班」，後來於 6 月 6 日改稱為「圓山軍官訓練團」，並進駐台北大直。在「圓山軍官訓練團時代」（1950 年 3 月至 1952 年 6 月），蔣介石為了避免孫立人等受美式軍事教育，以及黃埔軍系等將領，對於「以敗軍為師」的作法反彈，並且為了表示慎重，圓山軍官訓練團的團長由蔣介石親任、教育長則為彭孟緝上將。白團來台後辦了很多培訓班與軍事制度的規劃，分別開辦針對少校以下軍官的短期普通班（一個多月）以及上校以上的高級班（三個半月），並且有人事相關訓練、聯勤後勤教育等等訓練課程的規劃與進行，對台灣的歷史影響甚遠。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韓戰爆發次年，亦即 1951 年，美國正式派遣軍事顧問團來台。1951 年 5 月 1 日美軍顧問團正式在台北成立，首任美軍

顧問團團長是蔡斯將軍（William C. Chase）。他曾於 1945 年 9 月率美軍第十一軍第一騎兵團進駐東京。蔡斯來台後，在耳聞日本白團的存在後，曾向蔣介石強烈抗議白團的存在。因為對美軍顧問團而言，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何堂堂美國少將，旗下率領約六百名陸海空軍官團，掌握七千一百萬美援的經費，怎會不如白團的 80 多名日本戰敗軍官？即使蔣介石一再接見美軍顧問團亦無法有效安撫。因此，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只好遣散白團部分成員，起初蔣介石想讓白團到金門去，但被岡村寧次回絕。不得已只好將剩下的白團成員遷校到石牌，改名為「實踐學社」（1952 年 12 月到 1965 年 7 月），希望能避過美方的壓力。白團雖然從圓山軍官訓練團改為實踐學社，辦得仍然有聲有色，但美方的壓力仍大，因此在 1953 年底白團團員從極盛時的 83 名逐步減為 18 名，並且改以「教授」名義聘請。

從圓山軍官訓練團到實踐學社，只是白團活動的名義變更，實質上蔣介石仍非常仰賴日人的幫助，甚至當時由圓山軍官訓練團所改制的實踐學社有「陸軍地下大學」之稱，也就是當時軍中一種不成文的說法：「非實踐學社畢業者，無法晉升為少將師長以上的職位。」此如同後來在七、八十年代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當時亦有「非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者，無法成為高級文武官」的說法相類似。

實踐學社開辦過聯戰班、戰史班、科儲班、高兵班、戰術教育研究班、海軍參謀學校、聯勤後方教育班等等，專門訓練國軍將領的軍事教育班。如知名的蔣緯國將軍、郝柏村等皆受過從高級班到聯戰班、戰史班等軍事專業訓練。聯合作戰研究班共舉辦了 12 期，每期人數約在 40 至 60 人之間，主要是「菁英課程」的培訓；戰史研究班主要學習戰史，作為儲備人才的手段，成員以少將級、沒有擔任現職的高級軍官為主，共舉辦了 4 期。高級兵學班則是以現役中將以上軍銜者為對象的在職班，由白團團長富田直接負責，共舉

辦了6期，每期人數10至20名不等。戰術教育研究班有3期，基本上由日本人背後協助，由國民黨自己的教員上課。可謂教育與訓練不遺餘力。

發生在1963年的「周鴻慶事件」，對白團造成影響。所謂的「周鴻慶事件」即中共的訪問團譯員周鴻慶在日本投奔自由，誤入蘇聯大使館，最後仍被遣返大陸。這個事件使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惡化，國民政府曾一度通告白團須立即返日，雖然未立即實施。1964年9月，岡村寧次的代表小笠原清前往台灣，與台灣當局商定再次大幅削減白團人數，後來只剩5人。石牌的實踐學社終於在1965年7月結束。從1952年12月到1965年7月，實踐學社存在長達13年之久。按理說，白團從1949到1965年應該算結束了，但因為實踐學社結束時仍有5名白團團員，即團長富田直亮、團員系賀公一、大橋策郎、岩坪博彥、立山一男等人，轉任至蔣緯國將軍主持的陸軍指揮參謀大學（位在大直）服務，這5人混合一些國府的中國教官以做掩護，改名為「實踐小組」（1965年8月至1968年12月底）。實踐小組的功能，即是在國軍將領在參謀大學經過10個月的「美式」軍事教育後，再集合優秀軍官施以6至8個月的日式「後期教育」。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於美、日不同風格的軍事訓練與教育的態度。不過，隨著留在台灣的白團成員年事已高，因此改由中國教官實際擔任授課，日本老教官只從側面作間接性、原則性指導。因此特別辦了「教官特訓班」，專事培養種子教官，並且有戰術推定指導講習班、評判人員師資講習班等。

白團的結束與1966年岡村寧次的逝世、蔣緯國後來轉任三軍聯合大學副校長，再加上「明德專案」（即國民政府另闢與西德間的軍事交流）的關係，白團終於在西元1969年全體成員回到日本，次年2月解散，正式結束其援華的歷史任務。

三、白團的歷史意義

白團的構想遠在大陸時期即已開始醞釀，誠如戴國輝老師所說：「蔣老先生對白團的構想早在大陸時，也就是說，國府中央未遷台以前，它所以取名為白團係對抗『紅』（赤軍）而來。因而有關白團的研究已產生了微觀及宏觀如何保持平衡而行之課題。白團就宏觀來定位的話該是屬於中華民國史的一部份。但探其微的話，白團大部分的實際活動都在台灣地區，圍繞著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之有關安全保障，特別在於軍政面起了作用。它亦可以說是屬於台灣當代史的一部份的。」⁹戴氏知道白團的事蹟很早，據其自述這段源由：「我有位鄉親是他（白鴻亮）的隨從翻譯，因而知悉有日本軍顧問團在台灣活動之事。斯時白團有關事項是屬於機密。雖然知道些許，當然不敢向外言及。」¹⁰白團的存在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與歷史意義。

（一）反共與報恩的情緒糾結

白團向來被認為是日本軍官報恩之旅。主要當事人之一的曹士澂將軍明白指出：「白團之援華，有因有果，蔣總統於日本投降當時，對日本寬大政策以及以德報怨之因，才有日後白團義助之果。」¹¹報恩固然是日本舊軍官援華的重要理由之一，但它的歷史意義並沒有那麼單純，日本軍官願意組成白團援華的動機是值得研究與探討的。

首先，取名「白團」就有其特殊意義。白團的成立是為了對抗「赤魔」。所謂「赤」者，即紅色之意，赤魔亦即共產黨的代稱，中日雙方對於「赤魔」

9 戴國輝，〈台灣史的微觀及宏觀〉，收錄於《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4期，頁20，1998.6。

10 戴國輝，〈台灣史的微觀及宏觀〉，收錄於《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4期，頁20，1998.6。

11 曹士澂，〈奇蹟仁恕與報恩的交集〉，收錄於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頁12～16。

的認知，亦可見雙方基本上都是站在極度「反共」的基本立場。而取名「白團」，代表雙方深層的心理潛意識的反映。白團的「反共」色彩是非常濃厚的。「反共」的動機，讓蔣介石與岡村寧次成為「白團」的共同催生者。然而，彼此之間是有不同盤算的。對蔣介石而言，美國既然不值得信任，並且對於美軍的作戰方式也較不能認同，選擇與日軍合作，是一種選擇，唯有靠日軍的作戰經驗與訓練，才能在當時政治與軍事氣候皆不利於國民政府的情況下，留下反敗為勝的一線生機。

而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化名為「白鴻亮」，蓋以當時基於保密因素（其實，美方未必事先完全不知道），因此每個來台的日本軍人都需要有一個中國名字，以作為掩護之用。據說「白鴻亮」的名字是由曹士澂所命名。曹士澂曾自己解釋：為了堅決反共，共產黨用紅色代表殘酷的流血鬥爭；而白色象徵光明正大，紅白不兩立！而富田直亮是有名的參謀，今後又是蔣總統的得力參謀，中國古時候稱呼參謀為軍師，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軍師是諸葛亮，既然富田先生名字中有一個「亮」字，因此就叫「白鴻亮」。「鴻」字是飛翔萬里，無拘無束的大鳥；「洪」與「鴻」相通，代表胸藏萬卷，學富五車。¹²此後 20 年，日本軍官富田直亮就以「白鴻亮」的名號領導日本軍官顧問團，因其為團長，故此團體也被稱為「白團」。

富田直亮是日本九州人，陸軍士校 32 期生，陸軍大學 39 期畢業。以經歷來考察，事實上富田直亮此人頗為優秀，他打破只有中尉以上才能進入日本陸軍大學的常例，曾以少尉階級特准入學。後來富田直亮擔任參謀，也到美國出任大使館武官，又曾在陸軍大學擔任幹事長（教育長），後任作戰課長與駐香港參謀長。由於岡村寧次的目標顯著，並且身體不好，因此推薦富田直

12 參閱楊碧川，《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頁 21～22。

亮，使得白團得以成立，而蔣介石則應用各種勢力與方法讓岡村寧次得以避開「頭號戰犯」的審訊。富田直亮從 1949 年介入白團事務，後來富田在台灣一直獲聘至 1979 年，於當年 4 月返日休假時，病逝於東京。¹³平心而論，岡村寧次對白團的團長人選，富田直亮並非第一人選。岡村寧次本來推薦的是陸軍士校 32 期畢業的天野正一少將擔任訓練蔣介石軍官團的任務，不過後來天野正一因故並未參與，才改由岡村在指揮支那派遣軍時的作戰課長富田直亮為主要成員。岡村推薦富田直亮的還有另一理由是，當時國民黨還沒有完全棄守大陸，國民黨軍隊仍在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等地作戰，而富田直亮熟悉這一帶的情勢，因此富田直亮曾經陪同蔣介石飛到重慶，希望對國共戰事能有所幫助。只是未料到，沒幾天的功夫國民黨軍隊竟然迅速潰敗，富田直亮也只能勸蔣介石離開重慶，到台灣重整國軍部隊。

白團援華動機的探討，值得一提的，個人反倒認為不是團長白鴻亮或其他白團成員，因為白鴻亮雖然貴為白團的團長，事實上他是受命於岡村寧次的。如富田直亮在東京旅社所言：「四谷（岡村別稱）先生的指示，即為命令，從大陸戰場遣送回來的每一個官兵，對偉大的蔣大總統，有再生之感！中國的赤禍，亦就是日本的危機，我能有機會到台灣去報效，不只是報恩，而且也是為了消弭日本未來的隱患。」¹⁴

至於其餘日本軍官等白團成員雖是自願參與，但動機上相較下較為單純，甚至其經濟與出路上的動機與考量，若相較於岡村寧次的遠見，實不足為道。對當時的日本軍人而言，在日本戰敗後，不但回到日本國內受到社會

13 白團團長白鴻亮視台灣為他的第二故鄉，臨終前他特別囑咐妻子，死後骨灰一半安置在日本東京，另一半安置在台灣。參見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前列照片部分。

14 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頁 42。

歧視，甚至於連基本的生活都發生困難，在這種情形下，相對於白團成員在台灣의待遇，顯然是相當優渥的。例如，每年夏、冬兩季有中山裝、配給酒、汽水、香菸或香菸代金，此外聯勤總部也每日送來定量的米、麵粉、食用油、鹽、燃料等實物，以當時戰後的軍人待遇而言，算是相當優遇了，至少在戰後的日本不見得有此待遇。白團成員大多住在北投的宿舍，並且有吉普車使用，甚至有轎車，與每年一次回日本看望家人的機會。類似的待遇跟當時與在台灣의軍人相比是相對優渥的，更遑提當時生活十分困苦의台灣人民了。既有台灣的就業機會可以養家活口，這也是日本軍人戰後謀生的另一種機會，不管站在「大我」或「小我」的立場上，事實上日本軍人沒有特別需要拒絕的理由。

比較值得研究的倒是岡村寧次的動機。岡村寧次在日本軍界，無疑是相當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岡村寧次也是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時的日本少壯軍人。他在 1904 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 16 期，1905 年時曾以步兵少尉階級參加攻打庫頁島（樺太）戰役，而當時正是日俄戰爭初期。他的戰功顯赫，學生眾多，例如發生在台灣의「二二八事件」中的行政長官陳儀，就是他的學生之一。岡村較早之前曾參與發生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的秘密作業，甚有野心。九一八事變在日本陸軍省方面，就有三個重要的負責人，亦即軍務局長小磯國昭、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和補任課長的岡村寧次，而當時的岡村寧次還是大佐（上校）。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次年，也就是 1932 年 5 月，陳儀曾在上海見過岡村寧次，並轉達了蔣介石有意避免和日本武力衝突的意見，並且表達國府軍討伐中共軍方針不變的意圖。此意圖與後來蔣介石為反共而借力於岡村寧次而成立白團的歷史發展，留下了一個重要的伏筆。岡村寧次後來升任為大將（上將），並成為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亦是指揮日軍在中國大陸華北的燒光、殺光、掠光的所謂「三光作戰」的大戰犯，屠殺無辜的中國人

即達5萬人之多，其屬於一級戰犯。¹⁵當其在中國橫行時，他提出「治安強化運動」；珍珠港事變後，又提出「完成大東亞戰爭兵戰基地」的號召，努力把中國作為侵略世界的基地。中共恨之入骨。

當1945年8月15日中日戰爭結束，蔣介石於8月16日即致電岡村寧次，提出投降原則，其中包括不尋常的「暫保現有武器裝備，保持現有態勢，並維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這是因為中國在北方沒有軍隊可以接收日本的武器與受降，如果日軍向中共投降，則會使中共直接坐大。所以蔣介石指示岡村寧次，「若遇到不法擾亂者，還可以自衛反擊。」

再者，蔣介石派最親日的何應欽將軍去受降，亦非偶然，因為他要與打敗的日本軍頭接觸，以為自己戰後所用。個人認為，這是蔣介石在考慮日本與中共之間的問題後，所做的決定，他不能讓日本軍的資源落入中共手中。岡村寧次曾在戰後，於「何應欽將軍感謝會致謝詞」中說：何應欽「多年的親日態度，早為日本國民所周知」。時日本的參謀本部次長河邊虎四郎亦打二通電報給在南京的總司令岡村寧次，以及在山西的第一方面軍司令官澄田暲四郎，頒佈新的作戰命令：即命令二位司令官，各自與國民政府當時的最高指揮官何應欽將軍和山西軍閥閻錫山締結「共同打擊共軍」的秘密軍事協定。由於岡村寧次與何應欽之密約在芷江簽訂，故稱為「芷江協定」。「芷江協定」基本上是一個反共的協定。於是岡村寧次和澄田暲四郎以及其他北進派的參謀們，在形式上雖向蔣軍投降，解除武裝，被收容為戰犯。但事實上，岡村寧次等人卻獲得國民政府的禮遇，擔任國民黨軍的剿共參謀。從日本戰敗，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敵將岡村寧次的身份，遂從「支那派遣軍總司令」轉

15 1945年11月，中共在延安公布一份戰犯名單中，岡村寧次列為第一號戰犯。

任爲「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並且負責遣送日軍官兵二百多萬人平安回日本。

蔣介石對日本的「以德報怨」政策，背後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以德報怨」，誠如戴國輝老師所說的：「蔣委員長對日的『以德抱怨』，中共大陸在對日本建交時宣示了『放棄戰時受害賠償』，部分台籍菁英份子肯定並主張了『後藤新平以及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的近代化有了奠基性貢獻』等，其實都可以概括爲與功利主義是『通底』的一種政治性宣示。」¹⁶ 蔣介石總統究竟是爲了私利而作此政策決定，或是爲了反共，避免亞洲中國成爲赤化的共產國家？其間的意義與動機十分複雜與耐人尋味。

但以德報怨政策多少背離了中國人的民心。據何應欽將軍對岡村寧次說「我們爲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艘，這佔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¹⁷ 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措施亦影響國際局勢甚大，此一措施不僅讓日本後來有復興的機會，亦使岡村寧次本於感恩的情緒而決定幫助蔣介石重整國軍戰力，甚而影響中共未能進一步赤化台灣。

一般認爲岡村協助國府組成白團爲「報恩之舉」。事實上，白團成員報恩的成分是有的。對岡村寧次而言，蔣介石的恩惠，一方面是家恩，亦即國民政府在戰後未刁難他，甚至用盡辦法保護他；另一方面是國恩，除了蔣介石的對日寬大政策外，蔣介石並極力維持日本的天皇制度、善待在華日軍、放棄賠償請求權、還放棄派軍進駐日本、並反對蘇聯進駐北海道、力陳美軍應單獨佔日本等對日本有利的種種措施與言論，都在在感動岡村寧次等日本軍人。況且，對於國共之間的鬥爭，大多數的日本軍人都將中國看成一個整體，而台灣與大陸的對立是中國人政治鬥爭的一種延續罷了；其次，日本

16 戴國輝，〈台灣史的微觀及宏觀〉，收錄於《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4期，頁14，1998.6，

17 何應欽，《中日關係言論選輯》，台北：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64，頁54～55。

對於共產主義是反對的，二次大戰時期，軸心國間的合作關係多少與其有一致的反共立場有一定的關連。岡村寧次認為，當時中共的坐大，對日本未來的前途並不有利，換言之，中國赤禍的蔓延，也將是未來日本的危機。幫助蔣介石反共，也間接爲了消弭日本未來的隱憂，一旦國民政府有機會反攻大陸成功，未必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與立場。因此，白團的成立內涵有其複雜的因素，應該不是單純以所謂「報恩」二字可以概括。個人認為其中蘊含岡村寧次個人更大的遠見，亦即日軍如有機會必須幫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鞏固亞洲的情勢，避免共產勢力的擴大與蔓延，以免影響戰後日本的國家命運，包括讓蘇俄的共產主義蔓延亞洲地區。再者，對於將二百多萬日本人運送回國，以保存日本帝國未來有復興的機會，亦是岡村寧次做爲日本軍人卓越的識見與感激蔣介石之處。這也說明了中、日間雖長達八年之久的抗戰，彼此可謂勢不兩立，但反共的立場似乎是雙方軍人的共同一致的想法。如此，顯見白團成員肯替昔日敵人（國民政府）領袖賣命的原因所在，亦反映日本軍人的歷史使命感與精神的表現，尤其是岡村寧次大將更是值得一提的人物。當白團的重要人物之一的日人小笠原清，在西元 1971 年八月號的《文藝春秋》雜誌上，刊載岡村寧次的遺稿云：「岡村寧次將軍認為，被埋沒的人，就應該被埋沒到最後。」這種無名英雄的胸襟，是值得吾人深思的。

相對於白團的團長白鴻亮而言，白鴻亮既是銜其長官岡村寧次之命來台組織白團幫助國民政府訓練軍隊，但其實際上的援華動機反而較爲單純。何況當時日本戰敗後，日本由盟軍美國入駐，職業軍人受到「追放處分」（整肅之意，不能擔任軍、公職），可說毫無出路。在這種日本軍人的出路與未來生活實在堪慮的情況下，有此一「報恩」的機會，倒也兩全其美。何況在長官岡村寧次的授意與支持下，白鴻亮與其他日本軍官自是沒有反對幫助國民政府軍隊的理由。何況，隨著共產勢力的蔓延，一旦台灣失去了反共的能力或

是被中共赤化，對於戰後的日本自是岌岌可危，相信這是岡村寧次與大多數反共的軍人所不樂見的。

（二）對台灣軍事歷史的影響

白鴻亮來台後，蔣介石即命其草擬「防衛作戰計畫」，並於台北近郊（今台北之石牌）成立「圓山軍官訓練團」，除白鴻亮外，並聘請日本海、陸軍少壯軍官計 80 餘人為教官，調訓了國軍中、高級軍官，予以聯合登陸、反登陸作戰及各兵科專長、後勤補給等等軍事訓練，直到任務結束始予解散。從西元 1949 至 1969 年，近 20 年間，白團的成員，全盛時期多達 83 名，所有人員都在這段期間進出替換。

就政治層面而言，白團的活動時間是二二八事件後持續將近 20 年左右的白色恐怖時期。在戒嚴體制下，更顯現其神秘性的色彩。這段期間，台灣經歷了 1950 年的韓戰爆發、蔣介石宣布在台「復行視事」，共軍攻打金門的大膽、二膽島、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訪台、第七艦隊派防台灣海峽、1951 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美軍顧問團進駐台北、1952 年「中日和平條約」在台北簽字等較重大的歷史大事。

白團除了訓練國民政府軍的軍官外，建立制度化的兵役制度以及規劃良善的總動員體制，是使中華民國政權得以在台灣存續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面對外在國際局勢的不明朗，國民政府對內必須培養實力，自立自強。

撤守台灣孤立無援的國民政府，面對美國態度的搖擺不定，以及中共隨時武力解放台灣的局勢威脅下，經過白團的研究與策劃，白團建議蔣介石要有效動員台灣人員與軍力，才能確保台灣的安全。有關軍事教育訓練，白團曾設計了四個階段來實行。第一階段：徹底提升各級軍官的精神團結及學術向上；第二階段：由白團教官 10 多名，和部隊共同生活教育團員，建立實驗部隊（1951 年在新竹湖口的陸軍 32 師，甚至成為白團軍官對蔣介石交代成果

的實驗部隊)；第三階段：推行日本陸軍大學的中、高級將校的長期軍事教育；第四階段：建立台灣全島各軍、公、民間機關統一動員體制。當然，以後還陸續有各種新的構想與訓練課程研發。

特別是建立台灣全島各軍、公、民間機關統一動員體制，其影響頗深。這項計畫由前第四師團動員參謀山下耕(易作仁)與大橋策郎(喬本)負責這項軍事改革計畫。白團成員經分析台灣的條件，認為軍事動員構想基本作法就是導入日據時代的動員方式。這項兵役制度與動員體制，早在日據時期約在1940年代，就已經被皇民化與國民精神總動員化過了，當時經由總督府有計畫的實施，因而這套制度化的動員方式推展得很順利，對於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言，並不陌生。對於台灣人而言，國民政府的動員體制與日據時期「戰時體制」相類似。這套為反共而進行的動員體制，對於在精神上承襲日據時期諸多制度精神的台灣民眾而言其實並不意外，反而相對於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軍隊而言較為陌生。由於當時台灣的軍隊的配備皆屬於臨戰的體制配備，這些部隊也幾乎都是從大陸臨編而撤退來台的，基本上就缺乏類似日本師管區司令部及聯隊區司令部等動員組織機構，因而在「上無可動員機構，下無可動員部隊」下，即使想動員日據時期台灣兵部隊，也因為欠缺資料而實行困難。1951年6月21日，山下耕與其他白團成員分析台灣軍隊結構的結果後，認為台灣軍隊的老弱殘兵實況，將嚴重影響國軍戰力，台灣軍隊的動員徵兵基礎可謂相當薄弱，更遑論將來要反攻大陸了？山下認為精強的部隊應以青年為中心練成健兵，因此必須透過制度化的招募新兵與汰弱換新，進行軍隊的大換血，重新訓練與整備。接著就展開其設計的動員體制，由山下耕全盤策劃，與大橋策郎、富田正一郎(徐正昌)、笠原信義、土屋季道、川田一郎、美濃部浩次、小杉義藏、河野太郎、松崎義森等人分別在台北石牌訓練動員幹部，為國防部做成各種動員計畫，協助聯勤總部的動

員研究，並指導各單位進行動員實施，在各縣、市政府，及各兵工單位、民營工場指導動員業務。

1952 年 2 月，蔣介石總統特別下令復興省（台灣）動員演習，這是蔣介石接受白團建議後，第一次在台灣動員演習，在白團成員的輔導下，一切按照原先設計的計畫進行演習，經此，國府主要官員第一次見識到日本式的計畫動員的威力與成效，從而體認到動員的效用與重要，亦奠定台灣後備軍人動員的基礎。

1952 年 8 月，國防部在石牌成立動員幹部訓練班，直到 1959 年 3 月底的 7 年內，一共辦了 45 期，訓練人次有 9330 人。¹⁸有了這批吃苦耐勞的台灣兵，更使得蔣介石總統對反攻大陸更加充滿希望。白團促使台灣軍事動員制度從日據時期的「戰時體制」過渡到國民政府時代的「反共體制」，有效地控制了台灣的社會資源。從基層的腳踏車到汽車、飛機等，從個人的民生物資到國家資源，隨時都必須因應國民政府的動員令。此外，白團還替國民政府設計了其他有關的軍事體制，例如：在 1955 年至 1967 年，國防會議下的國防計畫局（後來這個機構改為國家安全會議下的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由蔣緯國擔任國安會秘書長）負責協調軍事及經濟為國防計畫的一環，整合並召集了國防部、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各部門人材會議；1958 年 6 月 28 日至 1959 年 3 月，白團也共計訓練了三期的軍需工業動員班，人數約 169 人，對於台灣軍需工業動員的準備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圓山訓練團時代，白團共舉辦短期普通班（以尉級軍官為對象）10 期，受訓人員 4056 名；高級短訓班 3 期，受訓人員為黃埔軍校等軍官，總計 640 名，另有 161 名旁聽生。後來，美軍顧問團成立後，白團遂移到石牌，另

18 參閱楊碧川，《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頁 130～135。

行規劃其他訓練，以避人耳目。¹⁹

考中國軍事的現代化始於清代同治年間。當時各種軍事事務的初創，不論是教育或訓練制度的建立，大多依賴外力諸如英、俄、美、義、日等國的支援與協助。因此「整軍」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努力目標。國府撤台之初，內戰尚未結束，緊張的軍情形成台海首次危機。²⁰對國共雙方而言，台海危機是一種新的內戰經驗，國府離開大陸進入了島嶼，此後大陸與島嶼間的攻守防衛愈趨複雜，乃有所謂「外島問題的起源」。²¹在此「外島問題的起源」階段，1951年2月，國府和美國簽訂「美軍軍事顧問團協定」，5月正式成立「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²²國府一方面被動地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政策性介入，另一方面，仍暗中引渡白團成員來台協助練兵。在「明有美軍顧問團、暗有日本白團」的政策下，深深影響了台灣軍事歷史的發展。

白團對台灣的軍事建設發展是有相當程度的貢獻與影響力的，這也是其作為軍事顧問應有的成效。除了徵兵與動員的兵役制度改革外，其他方面亦有相當程度的介入與影響，例如：奠定台灣軍事地圖的基礎、海島防衛戰術的啓蒙等等。當國共鬥爭末期時，白鴻亮隨著蔣介石從重慶飛回台北前，曾經從成都帶回有關台灣的各種地圖鋅版，從而奠定後來台灣軍事地圖的基準。白團成員來台後，甚至曾經到台灣南部的鳳山和台中視察陸軍及裝甲兵的實況，以做軍事訓練上的診治參考。依照白團成員觀察後的研究分析，蔣介石的軍隊成員素質並不比日本軍差，但是教養程度顯然不如日本軍。尤其

19 《環球時報》，2005年01月03日，第23版。

20 張淑雅，〈金馬撤軍—美國應付第一次台海危機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冊，1995.6。

21 張淑雅，〈台海危機前美國對外島的政策（1953-195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6，頁297~303。

22 《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10，頁241~242。

是下士官的素質，其指揮技能、教育技能不如舊日本軍的上等兵；小隊長也不過舊日軍的伍長程度。換言之，國軍的指揮、教育能力較差。白團軍官相當注意部隊的編制、裝備、兵員素質、體力及順從性的檢驗。因此白團對國軍初期訓練的重點是重建部隊的士氣與提高反共精神，特別對軍官教育也分普通班、高級班等班別，以提升指揮與教育的能力。

在相關的軍事教材方面，由於白團在台灣開始訓練軍官後，嚴重缺乏參考書與各種資料，因此教材大多是白團成員自己編寫的。間接的則透過在日本的岡村寧次幫忙收集有關戰史、戰略、戰術等方面的資料收集與研究，成立所謂的「富士俱樂部」秘密機關，與在台灣在白團聯繫。「富士俱樂部」除了提供編寫教材需要的資料外，也提供白團成員各種日方報紙與日文雜誌等精神食糧給白團成員。易言之，遠在日本的「富士俱樂部」相當於白團的中樞神經，日本舊軍人深深控制與影響台灣的國民政府軍事發展歷史。

白團的影響台灣軍事發展，曾引起受美式軍事教育的孫立人將軍以及部分黃埔軍系將領不以爲然，對他們而言，日本是戰敗國家，爲何突然凌駕爲他們的老師、教官？但白團成員畢竟有其一套卓越的軍事訓練手段與戰鬥能力。後來經過實際軍事演練，連孫立人將軍也不得不佩服白團確實有值得學習的卓越軍事指揮能力。孫立人將軍尤其對白團的「夜戰」戰技感興趣，並曾力邀白團派人支援鳳山軍校，白團也派了 5 個成員去幫忙訓練野戰班及騎兵隊。可見白團訓練軍隊的能力是深受肯定的。

除了訓練軍隊的能力外，白團的戰情分析也頗受蔣介石重視。西元 1950 年 3 月中旬，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向蔣介石報告了中共犯台的可能性，並且白團也提出了因應台灣是海島的地勢，可以用防衛戰的「大島反登陸作戰」全套戰備來反制的戰略，其見解與分析獲得蔣介石的重視。所以，後來在軍官教育團的授課中特別加上白團建議的「登陸戰史」與「反登陸作戰要領」等課

程。像有名的「水際擊滅」、「夜戰」等也是白團成員訓練的構想與貢獻。²³後來這些戰略、戰技等深刻影響了台灣的戰略思考與軍事訓練模式。

（三）台灣揮之不去的日本情結

為何蔣介石如此願意重用當時「戰敗」的日籍軍人，並且希望日本軍人能於戰後協助國民政府訓練軍隊？畢竟，在當時日本是戰敗國，為什麼蔣老總統會找日本軍人來，先在圓山繼在石牌代訓國府軍的上層幹部？尤其是侵華軍的頭號大軍頭岡村寧次？分析其原因：一是，因為蔣介石總統深知日本之所以投降，並非真正敗於中國之手，而是敗於美國兩顆原子彈的攻擊。因此對蔣而言，平心而論，日本的戰略與戰術事實上並沒有失敗，這是原因之一。再者，則是蔣介石對於日本特殊的情結所致。

美軍作戰方式不同於日本，美軍屬於所謂的「強者戰法」，亦即作戰前，先來幾次、甚至幾十次空炸，然後再派遣直昇機與地面坦克部隊、步兵等推進。日本則不同於美軍者，它是偏向採用奇襲或夜襲的「弱者戰法」。蔣介石對於美、日雙方不同的作戰方式與戰略，認為日軍的戰術較適合台灣的环境，這也是他特別偏愛台灣軍隊接受日式訓練的原因。

此外，對於蔣介石個人而言，他對於日本是有一種莫名的崇拜，尤其是日本軍人的「武士道精神」，這也是日本情結的由來。蔣介石早年曾留學日本學習軍事，雖然未必學得日本軍事學的內涵，但是對於日本那一套軍事技能與生活常規的嚴格訓練，卻頗為印象深刻的。在西元 1910 年冬天，蔣介石（在日本時叫蔣志清）從東京的振武學堂畢業後，分配到北海道新瀉縣高田鎮的十三野砲聯隊實習。當時蔣介石是實習生，二等兵。至於當時的軍事訓

23 所謂的「水際擊滅」，也就是在登陸軍尚未完全集結之際，尚未站穩腳步時，守軍以攻勢予以擊滅。

練，主要是餵馬，以及替軍馬「擦熱」，使馬在嚴寒中血液流通。雖然未必真正學到日本的高超軍事技術，但是日本的軍事基礎教育，卻影響了蔣介石的生活態度。²⁴此外，日本的軍事組織與教育訓練非常經濟克儉，也符合我國的國情，特別是獨到的軍事教育與精神教育的結合，更大受蔣介石總統的歡迎。例如白團讓國府將軍首度接受戰史教育，就是國府軍所缺乏的軍事經驗之一。台灣部隊經過白團在暗中調教之後，成為「外在是美軍組織樣式，但內裡卻是日軍體系，且軍隊士氣養成是日本式的精神教育」。

在近代歷史中，對中國人傷害最深的莫過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大刺激，過去在中國人眼中，日本只不過是個蕞爾小國，他們學習中國的語文及文物制度，特別是唐代，日本有所謂的「大化革新」之類的唐化運動，而中國人向來自認為天朝大國，是文明舊邦。但是，諷刺的是，清廷卻在一連串勵精圖治的自強運動後，竟在甲午戰爭中卻敗給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這的確是奇恥大辱。可恨的是，日本人在戰爭中比起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更加殘暴不仁，因此，中國人普遍認為日本人恩將仇報、狡猾狠毒。經過8年抗戰的艱困苦難後，一般中國人對日本人更是恨之入骨。不過，此時的台灣，雖名義上屬於中華民國，但實際上台灣人對日本的感覺，並沒有中國人那麼刻骨銘心。

回顧國民政府過去聘任過德國、英國、美國及俄國等教官，但是結果並不理想。大陸的淪陷不僅使他憎恨共產黨，也開始對外國軍官與訓練、戰術見解的不信任。當然，東方與西方的物質條件事實上是不相同的。而蔣介石有留日經驗，特別是受到日本軍人的訓練與影響頗深，使得他「坐有坐樣、站有站姿」，而國府軍隊過去的軍事教育，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注意培養自

²⁴ 據高田市史記載，見《蔣總統秘錄》，第2冊，頁213。轉引自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頁51。

動負責，誓死達成任務的精神，也就是類似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加上西方的自由主義與享樂心理，更是與蔣介石所受的日式教育格格不入的。所以，蔣介石苦口婆心告誡他的子弟兵，要向日本人學習，因為唯有東方文化的日本人與中國相同。當然，國民政府的軍隊中，特別是支持蔣介石的軍方人士，並不是沒有人提出質疑，例如留學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將軍與有「小蔣介石」之稱的陳誠，剛開始都不以為然，但是後來白團在諸將領前，要求對空實彈射擊以展示戰術實力，事後軍事演習的成功，才使得孫立人與陳誠對白團成員刮目相看。

（四）白團對國際政治史的影響

嚴格說來，白團對整個國際局勢影響甚為遠大。在國際政治史上，白團的最大功績之一，在於實際介入與中共的軍事對抗，以致讓國民政府能保衛住金門與馬祖，這顯然是深具國際政治意義的。1954年9月，中共開始猛烈攻擊金門島。白團立即介入防衛金馬的軍事活動，這也是白團工作績效的展現機會。1958年8月23日中共再度對金門島展開猛烈攻擊，期間亦不乏白團成員展開防衛的活動。由於白團的指揮得宜與戰略分析精闢，所以金、馬並沒有被中共軍事赤化，不僅間接增強了蔣介石個人的反共信心，白團的表現多少受到國府將領的肯定與認同，重要的是給當時兵敗如山倒的國民政府在一片飄搖中打了一劑強心針，國軍士氣大為提升。由於金、馬島群瀕臨大陸，與台澎本島構成三角防衛戰略，使台灣能擁有向西延伸近200公里之戰略縱深，這對台灣人民而言，無疑是一道安全的「心理防線」。這些都讓蔣介石總統冀望於白團的復國大計，有了可能落實的希望與信心。甚而更強化了台灣軍事訓練的內在化質變，國軍部隊改革的步伐加快進行。

在當時共產主義蔓延的趨勢下，美國曾壓迫國府自金門與馬祖撤軍，但蔣介石卻不願放棄金、馬，這是有國際政治意義的。蔣介石的戰略想法與白

團的幕後建言關係，顯然深具思考空間。金門島原來並未有永久性的工事，但白團勘查了金門的地質特性後，建議蔣介石總統鑿空太武山以作為國軍作戰的天然掩體，太武山標高 253 公尺，地勢陡峭攀爬困難，實為易守難攻之地，太武山軍事工程的進行無疑是一項重大與艱難的任務，但蔣介石接受了這個建議。後來事實證明這項軍事工程的成功，不僅使得金門成為中外知名的反共前線堡壘，也是重要的反共軍事精神象徵。由於金門防禦工事固若金湯，才得以抵擋住八二三砲戰中 10 多萬發砲彈的轟擊。金門、馬祖保衛戰的成功，事實上政治意義大於軍事價值，誠如郝柏村在卸任行政院長時接受媒體採訪所說的：「守著大膽島，就是保衛中華民國的生存！沒有金門，就沒有台灣！」金、馬的存在，亦即中華民國國號的存續。²⁵ 金馬的固守使得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心理負擔大為減輕，也對國民政府的軍事能力與政治態度有了改觀的空間，後來遂將台灣納入其防堵共產主義蔓延的重要伙伴之一。

1951 年 9 月 4 日，對日講和會議在英美等國主導下於舊金山召開，並於 9 月 8 日正式簽署和約，日本隨即於 11 月 18 日加以批准。但後來日本在 1952 年的中日和約中，卻僅承認「放棄」台灣、澎湖，並未明言交還給中國，亦未確定台灣最終的歸屬，因此遂啟後來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之說法。²⁶ 對於國民政府而言，金門、馬祖無疑是中國的領土，只要「中華民國」繼續領有金、馬，就能使「台灣地位未定論」出現國際法理上的破綻，這顯然是蔣介石懂得國際政治巧妙之處。只要國民政府不放棄金門與馬祖，金馬地區就如同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一條剪不斷的臍帶。也因此，國府保有金、馬，美援就能滾

25 張火木，《金門古今戰史》，台北：麥田出版社，頁 51、89。

26 對日和約第 2 條規定：「日本茲放棄其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及要求」。參見每日新聞社編，《對日平和條約》，日本，昭和 27 年，頁 520。轉引自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頁 378。

滾而來。

韓戰與越戰使美國重新檢討其亞洲政策。²⁷由於白團介入防衛金門、馬祖的軍事事務，使得金馬防衛成功得以免遭受中共赤化，對台灣的民心、士氣也起了相當大的安定作用，結果讓國府得以間接的軍事手段，將金門、馬祖變成所謂政治上的「美金盒子」(dollar box)，在此局面下，美國不得不支持國府的經濟建設計畫，台灣加緊腳步成為反共基地要塞化，更使得美國不得不配合國府的「反共大陸」政策。

對國府與蔣介石而言，保有金、馬，台灣才得以代表全中國的名義要求美援的繼續支持，反攻大陸的希望才不至於落空。即使後來台灣歷經中、美間的斷交，甚至美國與中共建交等不利於台灣的國際局勢，但是其間因為白團的微妙介入國共間的內戰，為國府與蔣介石總統爭取了生存的時間與空間，即使發展到今日間國際局勢的複雜變化，但白團的影子始終存在著歷史性的影響，這些，相信都是白團成員未必能預料得到的歷史意義。

四、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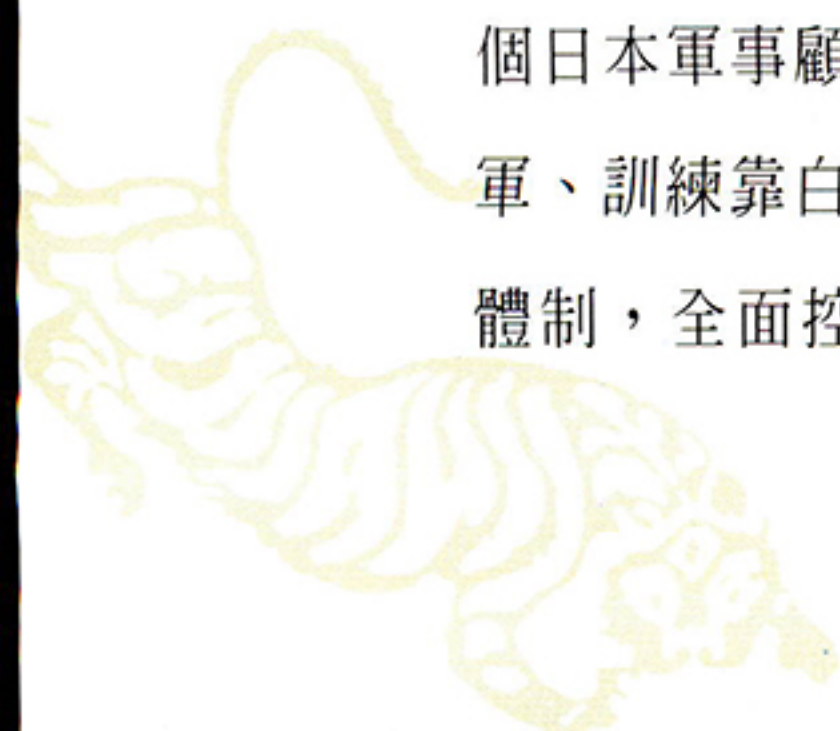
白團是國共內戰結構下的歷史產物。對蔣介石而言，他是希望白團能用日本式教育訓練為其訓練優秀的軍事人才，除了對一般兵種的訓練及陸軍大學教育、研究創立各種軍中人事與後勤等制度外，在必要時亦能以一部份人力直接參加國軍部隊工作。在國、共前後約四年左右的內戰打下來，國府一共損失了八百多萬人，其中有四百多萬人被俘。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希望能東山再起。白團的存在，無疑使其寄託甚大的希望。況且在 1949 年底

27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2002.2 初版，頁 402。

至1950年初，共有約六十萬部隊與五十萬公、教、平民與特務人員逃難到台灣，蔣介石深信只要凝結力量自然能有所作為。國府政權的穩固除了與發生於1950年的韓戰有關外，白團在幕後的協助亦扮演微妙的角色。西元1958年8月23日下午7時30分，中共解放軍由福建對岸開始砲擊金門。短短五天內，共軍一共打了十萬多發砲彈。美國基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關係，決定支援蔣介石，並且警告中共不要進攻金門。當8月23日發生了著名的「八二三砲戰」時，白團曾在8月25日赴馬祖前線視察，並且指導守軍指揮部實施兵棋演習。白團卓越的戰略分析深受蔣介石佩服，如對馬祖的戰情分析即是一例。當時的富田直亮（白鴻亮）認為，共軍極可能聲東擊西，因此雖然對金門必須作充分補給準備，但是共軍也有可能以攻擊金門的方式來引起國府注意，進而對馬祖採取突擊行動。故砲戰後，白團成員也常親自到金門、馬祖實地視察與督導防務。蔣介石對白團的建議與分析幾乎言聽計從，這是白團在台灣活動中所展現的實力使然，由此，亦可見白團確有其特別的戰術專長與卓越的戰略見解。

白團對於國府軍最直接的貢獻在於1949至1952年間，此時正是台海首次危機，金門等外島重要的防衛時期。根據舊金山條約，當時日本受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託管，因此白團援華的軍事活動在當時的國際約定上屬於違法行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白團的歷史也顯露出在台建軍的國際違法性。

蔣介石把六十萬大軍帶到台灣，重新整編，要反共雪恥，「反共復國」的希望在對美國失望之餘，幾乎全放在白團的身上，冀望依靠他所信賴的這個日本軍事顧問團能使他敗部復活，一雪前恥。當時台灣可說是「武器靠美軍、訓練靠白團」。白團幫助蔣介石將日據台灣的戰時體制改換成國府反共體制，全面控制了台灣的社會資源，亦即從軍事上的方式達到政治上的目



的。因此，從歷史事實而言，白團對蔣氏父子有極大的貢獻，即使白團後來在美方的壓力下逐步解散，但「白團」——這個國共鬥爭下的產物，在台灣的歷史上卻有其不可抹滅的歷史意義。

～參考資料～

- ◎中村祐悅，《白團》，東京：芙蓉書房出版，1995.6.5。
- ◎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台北：時報文化，1996.7.20。
- ◎楊碧川，《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台北：前衛初版社，2000.7 初版。
- ◎吳相湘，《民國史縱橫談》，台北：時報文化，1980.5.20。
-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上、下冊），台北：商周出版社，1995.4.25 初版。
- ◎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台北：天下文化，1997.7.30 初版。
- ◎何應欽，《中日關係言論選輯》，台北：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64。
-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2002.2 初版。
- ◎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1988。
- ◎潘乃德博士著、黃道琳譯，《菊花與劍》，台北：桂冠，1974.4。
-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1977。
- ◎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
- ◎段昌國等編著，《現代化與近代中國的變遷》，國立空中大學，1997.1 初版。
- ◎何應欽，《中日關係言論選輯》，台北：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64。
- ◎吳明勇等編，《陸軍前鋒部隊四十年史》，第六軍團司令部，1995。
- ◎成儒譯，《日本明治時代陸海軍建設史》，國防部編譯局，1971.3。
- ◎《陸軍第一軍團沿革史》44 年度，陸軍第一軍團司令部編。
- ◎《陸軍沿革史史稿》，卷一，陸軍總司令部史政處編印，1958.12。
- ◎《陸軍沿革史史稿》，卷二，陸軍總司令部史政處編印，1958.12。
- ◎《陸軍在台建軍史》，第一冊，陸軍總司令部編，1983。
- ◎《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10。
- ◎張火木，《金門古今戰史》，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 ◎張淑雅，〈台海危機前美國對外島的政策（1953-195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3 期，1994.6。
- ◎張淑雅，〈金馬撤軍？美國應付第一次台海危機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冊，1995.6。

◎吳錦發，〈白團震撼〉，《民眾日報》，1996.5.12。

◎吳明勇，〈評介中村祐悅著《白團》—兼論戰後初期台灣陸軍野戰軍團的形成〉，《近代史學會通訊》，第7期，1998.4。

